

风险叠加 欧债危机尚难烟消云散

苏亮瑜

2012年二季度全球经济继续笼罩在不利因素交织的阴影之下,尽管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希腊政治危机得到解决,欧盟峰会出乎市场意料地就援助资金使用等问题达成协议,但这些利好因素并没有改变金融市场震荡运行的格局,全球主要股指大幅震荡。

欧洲市场融资压力呈现两极发展: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德国短期国债收益率甚至跌至负值的同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价格再次下跌,收益率逼近或超过央行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前的水平,6月末两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6.52%和5.77%。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二季度全球贸易增速比上年大幅放缓7.1个百分点之后,今年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呈现增长乏力的格局,尤其是各国对欧元区出口贸易明显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16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贸易

易增速的估值下调0.3个百分点至3.5%。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欧盟当局一直忙于应对日益深化的主权债危机,但各国实施财政整顿、欧央行流动性操作以及提前建立ESM基金等措施,并不足以弥补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安排和欧央行无法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等制度性缺陷,南欧国家主权债危机和银行业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仍未打破,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尽管一季度欧元区生产总值(GDP)实现近零的增长率,避免了在技术上落入衰退的境地,但经济增长动力大幅衰减。根据欧盟委员会今年春季做出的预测,2012年欧元区GDP增速为-0.3%,其中重债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别为-4.7%、-3.3%、-1.8%、-1.4%,显示债务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仍在发酵。

其次,工业生产继续放缓。根据市场研究机构Markit Economics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欧元区制造业PMI为46.4,该指标在过去十个月中有九个月都低于50,德国(PMI)也连续5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显示工业生产活动持续萎缩。

再次,失业率居高不下。受劳工制度缺乏弹性和高福利政策影响,欧元区劳动力市场状况堪忧,重债国失业率持续攀升。5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为11.1%,创下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新高。希腊、西班牙失业率分别达到21.9%、24.6%,两国青年失业率甚至高达52.1%,这意味着就业困难可能由周期性向结构性问题演变。

同时,欧元区主权债与银行业危机有互相推动、继续深化的可能。截至2011年末,欧元区债务占GDP比例已升至87.2%,远超60%的警戒线。成员国之间债务关系复杂,风险敞口巨大,仅德国、法国对南欧五国的债权就分别高达7040亿美元、9110亿美元,约占两国GDP的22.3%、35.9%。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信贷资产规模庞大,银行业杠杆率较高,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银行业资产占GDP比例都在200%左右,如果各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抑制主权债危机与银行业危机之间的传染效应,欧元区爆发全面危机并非耸人听闻。

此外,紧急性救助资金规模不足。虽然欧央行通过两轮共计1万亿欧元的LTRO缓解了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但除此之外欧元区应急机制安排并不充分,危机救助资金规模偏小。即使ESM提前在7月份启动,整个欧元区的救助资金仅有1万亿欧元(其中还包括IMF提供的资金以及已向希腊等国支付的4855亿欧元),与潜在风险相比规模明显不足。

最后,欧元区体制改革进程滞后于危机发展。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

阿迪达斯关厂 敲响经济转型的警钟

江德斌

继2009年耐克关闭在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后,另一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也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中国各类成本的急速攀升,已经让“中国制造”的红利优势不再,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开始将生产线外迁,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迁移。

眼看四年一度的奥运盛典即将拉开帷幕,运动品牌巨头阿迪达斯却陷入了“血汗工厂”的舆论压力下,媒体指责其设在柬埔寨的服装加工厂工资低、工作时间过长,有压榨工人劳动的嫌疑。而就在阿迪达斯回应指责不实之后没几天,又宣布要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引起舆论对其加大产业转移力度的关注。很显然,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已经波及更多的行业领域,就连我们最具竞争优势的服装业、制鞋业,也已风光不再。

金融海啸以来,已有不少外企选择撤离中国,将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搬回本国。比如美国建筑机械制造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已将其在中国的挖掘机生产项目搬回了本国。福特汽车公司要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也把它在陶瓷杯制造从中国迁回美国中西部。松下在上海所建的等离子面板工厂将会在今年内逐渐关停,松下以后会把全球等离子面板生

产业务集中在本国本土生产。

种种迹象显示,我们曾经最引以为傲的成本竞争优势,则正在快速消失,至于“世界工厂”的名号还能戴多久?阿迪达斯不会是最后一个撤离中国的外企,但它的经济理性选择却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生产成本优势的丧失,已将中国制造的长板变为短板,亦敲响了经济转型的警钟。

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意味着未来劳动力将随之减少,不再可能是无限量供应,“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已步入拐点。当下不仅是工资成本,土地、水电、原材料、运输等成本均在上升,而环境污染、税收优惠取消、行政效率过低、生产率低下、生产质量差等因素,也都对制造业形成压力。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吸收外资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同比下降。

外资制造企业相继撤离中国,提醒我们不能再走依靠低廉成本的老路,必须要尽快实现经济转型,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为重点,促进产业升级。改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合现代化制造业的人才,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也要加快制度化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坚持依法治理,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给企业减轻不必要的负担。只有这样,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才能占据有利位置。

资本主义需要自我改革

李克

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人心理产生了很大冲击。比如,前些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毁灭资本主义的十大泡沫》,文中列举了医疗泡沫、政府泡沫、CEO薪酬泡沫、不平等泡沫、债务泡沫、全球失业泡沫、油价泡沫、风险泡沫、缓慢增长泡沫、自私的美国泡沫等十大泡沫,认为这些泡沫合成一起,足以毁灭资本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诞生至今遭到的质疑不断。最典型的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看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危机表现形式,即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与劳动群众有限的支付能力的矛盾。为什么劳动群众的支付能力有限,不足以消化所有的产能?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将原本属于劳动群众的工资据为己有。收入的不平等,最终造成了内需的匮乏。

实际上,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也可以追溯到美国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IMF前首

席经济学家拉詹的统计,1970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前1%的人口,其所得占国内总收入的比例由8.9%上升到23.5%。收入前1%人口的工资增幅要比后10%人口高出65%。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无产阶级不满意,要骂娘,执政党要丢选票,如何办?克林顿提出“居者有其屋”,政府补贴收入不足的群众购房;小布什利用低息政策,放宽信用标准,让不满足贷款条件的群众也可以用按揭购房。十年的民粹主义吹大了次贷这个泡沫。

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固然存在,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之前的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收入分配更加的不平等。奴隶、奴仆也配跟主子谈收入分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18世纪大英帝国的贸易难题:中国的丝茶潮水般地涌入英伦,而英国的货物愣是一点也卖不到中国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解释到:大清帝国的平民是如此的贫穷,比我国最穷的阶层还要困苦数十倍,哪有什么需求可

言。只可惜彼时没有WTO,两国无法协商再平衡,英帝国只好求之于无耻的鸦片了。

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资本回报存在边际递减规律,万有引力会将任何过高的资本回报拉回到均值水平。资本又是稀缺的,绝对大部分人的初始资本拥有禀赋是大致相同的。因此,按照资本主义内在运行规律,其结果应该是制造出一个大比例的中产阶级阶层出来。少部分运气特别好、初始禀赋特别好或者运气特别差、禀赋特别差的人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19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质疑声中,经历了自我完善,制造并争取到了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拥戴,才最终成为20世纪的主流思潮。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最终取代封建主义并站稳脚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尊重个体权利,尊重平等自由精神,解除了封建主义强加于人的种种枷锁。现在资本主义步入困境的原因也正在于这种平等精神逐步消退,垄断趋势开始抬头。垄断有自然经营垄断,有自然资源垄断,还有权力垄断。第一种情形不足

为虑,上世纪90年代微软如日中天,曾引得各国政府焦虑,但今天已经被谷歌、Facebook等后起之秀逼得步步后退。真正对个人的权利造成损害的是后两者,尤其是权力垄断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情形之下,原本属于个体的正常所得,被权力垄断者与寻租者瓜分,而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丛林资本主义诞生,在21世纪的寡头资本主义诞生。

消除这种风险,资本主义需要再次自我完善,而不是唯民粹是瞻的放水、放水、再放水。止痛药可以止一时之痛,但未必止一世之痛。只可惜,改革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上市公司利润占GDP比率接近11%,创历史新高,而另一方面员工工资占GDP比重却降至44%,弱复苏再次以压缩平民工资为代价得来。这样的结果,也难怪右翼报纸《华尔街日报》要刊登毁灭资本主义的十大泡沫了。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

状元抱负、公务员考试与国家创新

刘锐

笔者一位熟人的亲戚陈生,前不久从湖北老家来深圳找工作。小伙子毕业于武汉一所名牌医科大学,按理说找个专业对口的医院上班是“正道”,他的亲戚也帮他联系了关内和关外两所医院去实习,但陈生晃荡了两个多月,至今还在其亲戚家待业。原来小伙子铁了心要从金融证券行业。陈生认为,这一行来钱快,工作体面,是典型的金领,混得好,一下子实现财务自由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据熟人讲,陈生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猫”在家中苦读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教材,但前不久考试未果。笔者遂劝陈生,5年医学本科熬出来不容易,农村父母节衣缩食供读书更是于心何忍,放弃本专业太可惜。再说,现在证券行业这么低迷,很多公司都在裁员,这方面的履历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敲门砖,随便哪个单位都会拒绝你。但对陈生的劝告,陈生不以为然,仍想弃医从“证”。

对“钱”景心向往之的不仅仅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陈生们,另一群顶着耀眼光环的天之骄子——高考状元也是如此。一份调查显示,国内高考状元在选择大学专业中最青睐经济管理专业。1999-2010年的12年来,近400名高考状元选择扎堆经济管理专业。据媒体报道,东北师大附中今年有27名高分考生收到香港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选择金融类专业,更多是流动性强,很难遏制资产负债表衰退。因此,当前欧盟和IMF若不对症下药地出台针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救助方案,欧元区风险或将成为不定时炸弹,使欧盟乃至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的不稳定和不可预见之中。

再看香港地区。香港今年17名高考6A、5A状元中,15人挤向最热门的商科,更有一半人都选择环球商业管理专业——一个被比喻为投行敲门砖的专业,另外两人报读法律与数学,人文社科则无人报读。虽然香港没有内地“炒状元”习惯,但他们的择校意愿仍然很快成为本地Face-book上热点,引来本地舆论纷纷批评,惊叹高考状元们价值观竟然如此单一和功利。

同样是考,现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堪比曾经的高考。与高考的录取率相比,“国考”竞争惨烈程度是高考的几十倍。去年“国考”招录比率仅为1.15%,税收、海关、国土等掌权掌钱部门很吃香,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达到4124:1。一个旅的人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最终胜出者当非泛泛之辈。而从考生生源看,不唯已踏入社会的在职精英,很多高校本科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也加入到公务员招考的角逐中去,被称为公务员考选闹剧。

个人志趣是职业成功的起点,大量有禀赋之人不能人尽其材。首先,对其自身发展不一定有利。以高考状元为例,中国校友网发布的调查显示,自1977年至2011年的35年间,中国两岸四地的2000余位高考状元,鲜有成为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顶尖人才,大部分高考状元毕业后都“泯然于众人矣”,其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其次,更严重的是,将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才资源错配,进而拖累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消磨一个民族的创新基因。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至ppl18@126.com。

焦点评论



保障房中有黑洞,专项资金被挪用。为何保障多批漏?只因考核少权重。市政建设先上马,民生项目后开工。问责从严有必要,惠民承诺莫落空。

赵乃育/图 孙勇/诗